



跪在
真理与美德
的脚下

GUIZAI
ZHENLIYUMEIDE
DEJUEXIA



余开伟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跪在真理和美德的脚下

余开伟 著

房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晴

封面设计 应梦燕

跪在真理和美德的脚下

余开伟 著

*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0.25印张 1插页16万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31-0246-3

I·125 定价: 3.70元



前 记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我正值弱冠之年即开始尝试文艺评论写作，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电影创作》、《湖南文学》、《湖南日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习作，其中有的文章曾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大影响。例如发表在1961年6月23日《光明日报》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构成悲剧冲突吗？——与顾仲彝同志商榷》一文，因为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社会主义时代存在悲剧这个新颖的观点，向权威戏剧理论家问难，曾经引起过文艺界的关注。后来，我离开学校奔赴新疆专业文艺团体工作，仍陆续在中央和省市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得到文艺界前辈和读者的鼓励。

十年动乱时期，我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却不幸身遭劫难，流放戈壁，受尽折磨，中断写作长达十年之久。熬到粉碎“四人帮”后重回文艺单位，虽然鬓发青青，未届“不惑”，然而冲刺能力日益消损，已不复有当年的豪气和锐敏矣。所以我写得不勤，发表的文章不多，知名度也就不高。即便198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和夏衍同志论辩的文章《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赢得了文艺界和读者的赞誉，但这毕竟是强弩之末，自然掀不起什么激浪了。1985年我从新疆调回故乡长沙，从专业写作转到编辑岗位后，成年累月忙着组稿、看稿，“为他人作嫁衣裳”，时间和精力都顾不过来，更是极少动笔，收获十分有限。与当前

一些叱咤风云、驰骋文坛的中青年评论家比较，我的确是自惭形秽，非常汗颜的。

收集在这本集子中的几十篇文章，除个别篇目外，绝大部分是我从历年来发表的文章中选编出来的较有参考价值的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当时针对一些重大文艺问题和重要作品的争鸣文章；一部分是对某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特别是对新时期崛起的西部文学（包括新边塞诗）和西部作家的探讨和研究。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发表于不同的历史年代，而且大都是出自于我青年时代的手笔，它们必然显得幼稚和粗拙。我觉得，文学和历史一样，应该信奉真实和坦诚，不能随风趋时进行任何装饰和修改，哪怕是一丁点的装饰和修改，都意味着虚假和欺骗，这是对读者的最大亵渎。

因此收在本集中的所有文章都保持了原貌。我想，它们即令不能取悦于时下光怪陆离、花样翻新的时髦新潮，也许可以给严肃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留下一丝启迪，一点借鉴。倘能如此，也就如愿以偿了。

最后，我以虔诚的心情，衷心感谢广州文化出版社同志对于我的提携和帮助，在当前评论贬值、评论家出版集子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慨然愿意接受这本集子，使其得以面世，这种支持文艺评论事业的强烈责任感，这种不以名位取人的编辑作风，的确令人十分感动和肃然起敬。

作者

1988年6月20日于长沙望月村

目 录

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构成悲剧冲突吗？	
——与顾仲彝同志商榷	3
千秋功过 自有历史评说	
——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的感想	8
胡风与鲁迅	16
百年人物存公论	
——关于鲁迅评价问题的对话	19
对郭沫若历史剧《武则天》的质疑	29
应该公正评价《西安事变》的两个剧本	
——与方睿同志商榷	40
文学上存在“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吗？	47
作家和作品最宝贵的是什么？	
——从王蒙的短篇小说《最宝贵的》谈起	52
人品重于作品	
——从孟伟哉的讽刺小说《握手三景》谈起	61
鱼“防范”水的悲剧	
——评水运宪的短篇小说《防范》	67
拼搏者的呼号	
——读廖静仁的散文《船·纤夫曲》	73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	
——话剧《天山深处》观后感	78

和平万岁

——看法国影片《白鬃野马》有感	83
如何评价《两姊妹》中的人物	
——与铁牛同志商榷	86
谈两个风景画面的处理	89
辛辣的悲剧	
——浅谈布扎蒂的短篇小说《错死了的画家》	92
失落和迷茫	
——谈布扎蒂短篇小说《追捕老人的人》	95
提倡正常的健康的文艺批评	100
文艺家的一项光荣职责	
——从“五讲四美”活动联想到的问题	105
必须给群众艺术以应有的地位	110
漫谈小品文的命运	
——兼评《博格达》发表的几篇杂文	113
遥远的怀念	
——忆文艺前辈周立波同志	120
一瓣心香忆诗魂	
——记郭小川谈诗	130
崇高的艺术追求	
——著名作家孙健忠一席谈	138
拓荒的歌手	
——青年诗人章德益剪影	145
边塞山水画的探索者	153

一片真情话边关	
——老作家葛洛谈新疆创作	159
一席宏论见风骨	
——老诗人方冰谈新诗	161
公刘谈诗雅兴浓	163
西行万里访天山	
——记诗歌评论家李元洛	165
萧军一席谈	167
试论王玉胡电影创作的艺术构思	171
《远方青年》的成就与不足	185
《天山红花》的矛盾冲突及其他	194
重读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201
试论许特生小说创作的民族特色	208
作家邓普的创作道路	224
绿洲飘扬着“开发者文学”的旗帜	
——试论西部“开发者文学”的兴起及其发展	236
西部开发者文学的范畴及特征管见	256
提倡豪放、刚健的诗风	260
试论“新边塞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	267
略谈异军突起的新边塞诗	279
新边塞诗——西部开发者文学的强音	286
论新边塞诗的兴起及其流变	290
对新边塞诗内涵问题的理解	300

对发展西部诗歌运动的看法

——兼谈新边塞诗的建设 303

新边塞诗面临的困窘 300

(一)

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构成悲剧冲突吗？

——与顾仲彝同志商榷

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冲突，这在我们艺术理论领域内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由于过去很少有人在这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所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较模糊的，无法获得明确的概念。最近，文艺界和学术界针对悲剧问题展开了初步的讨论，并触及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冲突问题。我认为这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人们认识都是有所裨益的。

顾仲彝同志在《漫谈悲剧问题》一文中，论述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悲剧的内容和特征，发表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但是，我对于该文有的论点，还不尽同意，特提出来与顾仲彝同志商榷。

顾仲彝同志认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剧本是“不可能”写成悲剧的，其理由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得到圆满解决的。除非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能构成悲剧的。”我觉得，顾仲彝同志上述看法是不够确切的，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时代是新旧势力相互交替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

先进的新思想、新意识和落后的旧思想、旧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是相当错综复杂的，这都构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在新社会里，人民内部矛盾所包含的面又是极其广泛的，在人民群众内部中间，善与恶的斗争，美与丑的斗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也都普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和特殊情况下，它们都有可能构成一定的悲剧冲突。人民队伍中的某些人物，由于阶级出身的影响，本身性格的弱点或认识水平的局限，客观条件的支配，在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革命中，他们有可能犹豫动摇，迷途失津，对社会动向和时代潮流认识不清，甚至不自觉地堕落为阻碍历史向前发展的旧势力的体现者，因而酿成令人叹惋的悲剧命运。这种类型的悲剧，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看作“错误的悲剧”。这样错误的悲剧，虽然不值得我们同情或怜悯，但，至少对我们却能起着“借鉴”和“警惕”的作用，因此，我们是不能把它排斥在“悲剧”领域之外的。作家杜鹏程同志的优秀作品《在和平的日子里》中梁建的形象，正是这样的悲剧人物。

梁建，作为一个“多次通过历史风暴，带着不平凡的经历”的老同志，他曾经在解放战争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为人民立下过汗马功劳。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血和火的严重斗争考验的革命干部，在离开战场，换下军装，进入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却经受不起严峻的现实考验，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开始彷徨动摇了，变得卑怯而庸惰，患得患失，最后竟成了个人主义的俘虏。梁建，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批判形象，的确是一个既使人激愤而又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我们之所以激愤，是由于梁建丑恶的个人主义思想行为造成了优秀同志（刘子青）的

惨痛牺牲，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无可挽回的严重损失。我们之所以惋惜，是因为梁建毕竟是一个有过光荣历史、对革命有所贡献、在党的直接教导下成长的老干部。他的蜕化变质，对我们每个矢忠于党、对革命事业有着血肉深情的同志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极其痛心的事实。这种惋惜不是无原则的悲天悯人，而是基于对同志深切的关心，是基于对党的事业赤诚的爱。作品中正面人物阎兴（梁建过去的老战友）对梁建所怀的痛惜心情也正是如此。

梁建蜕化的悲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并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构成悲剧呢？事实上作家对梁建这个人物的艺术处理上，是掌握有度，留有余地的，并没有把他写成堕落为阶级敌人的严重地步。否则，梁建也就不能成其为什么悲剧人物了。作家在描写梁建形象的过程中，对其个人主义思想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也有意识地描写了他过去光荣的革命经历和内心时隐时现的革命火花。如工地上暴风雨将要来临时，也曾“激起了梁建的力量”，使他“想和同志们拧成一股劲来挑起这千斤重担”；当阎兴对他进行正面开导，引起他对过去革命艰苦年代战斗生活的回忆时，梁建甚至愧疚交集，痛苦地落下泪来。并且，作家还描写了梁建“企图唤起经验，唤起信心，唤起魄力，唤起才能”的内心矛盾和自我谴责，以上人物激烈的内心纠葛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其实就是构成梁建悲剧的一种特定的悲剧冲突。梁建这种内心纠葛和心理状态之所以是一种悲剧冲突，是由于他本身性格的弱点，个人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他迷途失津，无法抗拒非善的侵袭，让正确战胜谬误，相反地，却让谬误文

配了自己。这种悲剧冲突的性质，与恩格斯对悲剧冲突所下的定义自然是不尽符合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时代悲剧冲突在内容和形式上新的变化和发展。

诚如顾仲彝同志所说，一切悲剧都是建立在当时时代主要矛盾冲突上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我矛盾已经退居次位，人民内部矛盾占据了主要地位，所以，人民内部矛盾能够构成悲剧也就是势所必然，不足为奇了。只是这样悲剧在内容和形式上，与过去各个时代的悲剧性质有所不同而已。就以梁建这样错误的悲剧为例，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说明。

导致梁建个人悲剧的原因，是由于他本身政治热情的衰退，革命自觉性的丧失；对急剧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认识不清，犹豫动摇，因而变质掉队。酿成梁建悲剧的社会根源则是由于目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的存在，个人主义思想遗毒的传播。从梁建的悲剧中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必然要求及其在实现上和实践上不可能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可以构成悲剧，就是新旧意识之间、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正确和错误之间这类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同样能够构成悲剧的。

这种悲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将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旧势力的残杀影响及其对我们革命事业所起的严重危害作用，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从而使我们深加警惕，引以为戒，不致重蹈错误的复辙。而且它将能使我们加强自我改造的决心，激励我们更加奋发有为地赶上急速发展的时代潮流，自觉地争取成为历史的主人。所以，像梁建这样由人民内部矛盾所构成的错误的悲剧，虽然在我们新社会里是个别现象，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

性，却仍然是富于典型意义的。它将可以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借镜”，促使我们“愉快地与人类的过去诀别”（马克思语）。因此，否认人民内部矛盾构成悲剧的可能性，这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原载1961年6月13日《光明日报》）

千秋功过 自有历史评说

——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的感想

最近，怀着对文艺前辈虔诚的敬仰心情，认真拜读了夏衍同志在《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掩卷沉思，心情却很不平静，既因从中了解到一些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文艺战线的史实而感到深受教益；又因文中涉及到另一位文艺前辈冯雪峰同志和文学导师鲁迅先生的某些不公之处而感到深深遗憾。

夏衍同志这篇长文，主要是针对冯雪峰同志生前所写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见《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这篇材料而写的，作者开篇即声称他接受一位老朋友的建议，担心“再过些年，文化革命前后某些人凭空捏造、牵强附会，以及用严刑逼供制造出来的诬陷不实之词，就将成为‘史实’。这是对对不起后人的事情”，所以感觉“有必要把一些尚未澄清的问题说明一下真相”云云，可见它并非“信笔拈来”的即兴篇章，而是殷忧所在的可感之作，其良苦的用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无可訾议的。

冯雪峰同志所写的那篇材料，详细说明了三十年代“左联”时期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前后的具体情况，其中谈到了鲁迅先生当年对周扬、夏衍等同志的不满。林彪、“四人帮”一伙曾经利用这类材料